



THE BEIJING NEWS

创刊于2003年11月11日

总第2983期

统一刊号  
CN11-0245

主管  
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

出版  
新京报社

地址：  
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街37号  
邮编：100061  
传真：010-67106766  
新闻热线：010-67106710  
(24小时)  
发行热线：  
010-67106666  
新京报网：  
www.bjnews.com.cn

广告经营许可证号：  
京宣工商广字第0068号

常年法律顾问：  
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

声明：  
未经本报许可，不得转载、采用本报及本报网站刊载之内容。

### 更正与说明

#### 【文字更正】

1.1月9日A03版《相似的黑作坊，同样的监管缺失》(编辑：苏劲松)一文，第1栏第1、2行中“昌平区小口镇”应为“昌平区东小口镇”。

2.1月9日D05版(校对：陆爱英 编辑：许晓静)，“数据”一节，第1段第3、4行“每年都30%的速递增加”中，“速递”应为“速度”。

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、人士致歉。  
挑错热线：010-67106710  
栏目编辑：李赛

### 社论

# 过度补贴机关幼儿园加剧社会不公

幼儿教育的公平，事关社会的起点公平。广州机关幼儿园享受“天价补贴”则说明，一些地方没有做到尽力缩小教育公平差距，致力弥合社会不公，反而在恶化社会的公平环境。

据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，尽管2009年就曾表示过要逐步取消对机关幼儿园的补贴，但广州市本级2012年部门预算(草案)中，给8所机关幼儿园安排的一般预算资金仍高达7524.21万元，比去年大幅增加1770万元。这也是广州公开部门预算以来，给机关幼儿园的补贴上涨幅度最大的一次。

前不久，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《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提出严禁幼儿园乱收赞助费。但广州机关幼儿园享受的“天价补贴”，则提醒公众，还需要警惕少数“特权幼儿园”

向公共财政“乱收费”。机关幼儿园优先享受公共财政的“滋润”，显然有悖教育公平，加剧社会不公。

广州市人社局属下的两所幼儿园，上年结余资金合计约1400万，但这次仍旧得到1735万元的预算补贴。这种高额补贴的理由是什么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去年年初，广州“两会”前夕有政协委员提案称，在全市12个区(县级市)中，有近8个地方对民办学前教育的投入为零，以致民办幼儿园收费节节攀升。这种厚此薄彼、冷热不均的做法，自然让民众难以接受。

机关幼儿园所获财政补贴逐年提高，难免令公众质疑，这是不是在维护一种“特权”。相比街道办园、乡镇政府办园、农村集体组织办园等公办幼儿园，机关幼儿园一般优先配置给单位职工子女，而不向社会开放。这种特殊照顾公职人员子女的幼儿园，从本质来说，并非完全的公共产品，而是少数人的“自留地”。拿纳税人的钱为其逐年提高财政补贴，加剧了幼教资源分配不公的状况。

政府部门本应维护社会公平，对所有幼儿园一视同仁。换句话说，对幼儿园

应该进行财政补贴——如有些专家学者所言，把幼儿教育逐步纳入义务教育范畴，也是政府应努力的方向——但公共财政不能搞亲疏有别的“补贴”，而应注重公平、普惠。

现在，一些地方在公开表态时，都极力强调会执行中央部门的政策，推进教育公平，但在具体行动上，在财政投入上，却又暗度陈仓。正如广州2009年就向公众承诺逐步取消补贴，可事实上却在反其道而行之。这种公然违背承诺、加剧教育不公的预算，仍然如此大方地提交地方人大审议，原因何

在？当然，这份预算方案，不能通过并不是预算编制部门说了算，还取决于广州的人大代表。对此，大家都寄予良好的期待。

很多家长为了孩子上个好的幼儿园，不惜缴纳高额的赞助费，就是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所以说，幼儿教育的公平，其实事关社会的起点公平。广州机关幼儿园享受“天价补贴”则说明，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做到尽力缩小教育公平差距，致力弥合社会不公，反而在恶化社会的公平环境。这或许才是民众更为焦虑的地方。

### 观察家

## 能否给校车设定专用车牌？

沈阳市校车无法上牌，从另一个方面提示社会，校车的车牌登记、管理、年检等程序需要更加明晰的制度规定。建议设立校车专用车牌制度。

据《辽沈晚报》报道，沈阳市商业幼儿园为让远处居住的家长们放心，花费20多万元买来了“大鼻子”校车。但是，作为沈阳市第一台“大鼻子”校车，却迟迟上不了牌照，无法运行。沈阳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，没有现行法规批准沈阳市内可以给标准校车上车牌，何时能上还不知道。

无独有偶，几天前，南京市第一辆“大鼻子”美式校车也遭遇了同样的尴尬。由于申请“校车牌照”受阻，临时牌照过期以后无法上路使用。如此看来，新购标准校车上不了车牌的难题，

并非沈阳一个孤例。按校车安全条例的规定，校车向交管部门申请注册，需要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关证明，而这在现实中还没得到落实。

这事颇有些黑色幽默。正在酝酿中的校车制度就是要赋予校车“特权”，可是，校车如果连车牌都上不了，“特权”何来？所以，相关制度落地的速度还应加快。

校车无法上牌也从另一个方面提示社会，校车的车牌登记、管理、年检等程序需要更加明晰的制度规定。建议有关方面，不妨像军车、警车那样，设立校车专用车牌制度。

应该说，这既能更好地保障校车特权，也利于校车的规范管理。

在校车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中，明确校车要有校车标牌(载明号牌号码、车辆类型、核载人数等)，并装备统一的校车标志灯和停车指示牌，喷涂统一的校车外观标志。既然校车的诸多表征都要有别于普通车辆，使用专用车牌也是顺理成章；而且，譬如喷涂统一的外观标志等方式，容易被某些“黑校车”造假，而配发专用车牌，最起码还增加了一道有力的“防伪”标志。

如果考虑到校车将获

得使用公交车道等特权，使用专用车牌无疑也更利于电子眼等执法设备的自动甄别，从而避免诸多执法方面的麻烦。

现实中，已经有些地方做出类似尝试。去年12月中旬，吉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宣布，该省校车牌照将统一采用专用号段“XS”(“学生”拼音字母缩写)。这是一个有益的探索。

其实，吉林省的“校车牌照统一采用专用号段”，比普通牌照前进一步；在此基础上，还可以考虑制定发放统一的“校车车牌”，在校牌的颜色、字体、车牌大

小等方面，让人很容易和普通车牌区别开来，保证校车的“特权”。采用专用车牌，还可以在车辆行驶证上注明该校车的法定规范，以此取代“校车标牌”，也便于交警部门进行直接管理，避免多个部门对校车行政界定所带来的弊端。

新购“大鼻子”校车无法上牌照，说明关于校车问题，不仅仅需要一部安全条例和一套新的校车标准，构建一套综合且深入行政各个领域的校车管理制度仍需努力。

□燕农(大学教师)  
相关报道见A22版

### 来信

## “龙票”发行量能更透明

今年“龙票”发行首日，盛况空前，市内各集邮公司人头攒动，不少集邮爱好者提前连夜排队购票；当天小版票市场价格翻了3倍，据说外地翻到10倍。

近日，笔者到马甸邮币市场，看到“龙票”价格仍居高不下。何以出现如此“龙腾”景象？专家分析，“龙”情结和升值潜力是“龙票”大热的原因。除此之外，笔者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。

“物以稀为贵”是决定邮票价值的基本原则。首轮生肖邮票中的“猴票”之所以现在几乎“天价”，与其是生肖票的首枚且发行量不大(据公开的数字是80万枚)直接相关，而其后二三

轮生肖票发行数千万枚之多，自然就不足为贵了。

因此，为了保护全国集邮爱好者的热情和权益，也为了避免投资者的盲目误投造成损失，邮票发行单位应及时发出“安民告示”，即使目前不能公布邮票具体发行数量，也应说明与近年生肖票发行数相比，是大体相当或是有所增减，以消除社会上不必要的误传误解，从而抑制龙票过热，稳定邮票市场。

□肖观(退休教师)

## “30亿人次流动”说明了什么

据报道，“春运”这种几十亿人次的大规模流动8日正式开启，40天时间内，将有31.58亿人次流动。这是中国历年春运中出行人数

首次突破30亿人次。

看着这突破30亿的“数字奇迹”，又想起那老生常谈的问题，为什么每年春运有这么多人踏上迁徙之途？

如果遍布全国的外地务工人员，在打工地都能被城市完全接纳，无区别对待；农民工和市民待遇相等，权利相同，更多的新一代农民工彻底融入城市，扎根城市，那么过年不过是一个传统节日，心安之处即故乡，在哪儿过节都一样——春运能压力还会像现在这么大吗？

所以，春运回家潮构筑的天文数字，其实标注的是多数务工者对权利的渴求，对归属感的渴望，回老家，除了文化心理之外，还有一种被迫和无奈。所以，订票网站日均点击超10亿次的瞬间“世界第一”，并非什么

可喜的奇迹，“数字奇迹”背后，那些权利沟壑如何填平，才是当务之急。否则，每年的过年回家，都注定不会是一个温馨温情的字眼。

□李晓亮(媒体人)

## 受骗女生还要骗色教授“谅解”？

据报道，北大教授王学明指控情人敲诈勒索30万元，致使小他26岁的纳西族女子小丽被逮捕(人物均为化名)。记者1月8日获悉，北京市海淀区检方对小丽做出不予起诉决定并将其释放。

从报道上看，小丽获释，还得感谢王学明。因为海淀检方认为，对小丽不起诉的一个重要理由是“被害人王学明已明确表示谅解”。王身为北大教授，骗取小他

26岁的小丽发生性关系，并以能帮她升大学为名，保持情人关系两年之久，王学明怎么倒成“被害人”了？

法律如此认定，是因为不管男方霸占了女方多少年的青春，都视为一种道德问题，最多是纪律处分，但一旦女方向男方索要赔偿，并且使用威胁话语，那这件事情马上就变成了刑事犯罪。

要打破将那些无耻之徒瞬间转身为“被害人”的情况，有必要承认所谓的受蒙骗的“小三”向男方的索赔权。如果你是故意蒙骗对方，造成对方时间损失与精神痛苦，相对一方都有权向法院主张赔偿。如此，在成本与收益权衡之间，北大教授再遇到小他26岁的女生时，或许就不会蠢蠢欲动了。

□杨涛(法律工作者)